

近代湖南名



湖湘文化研究丛书

人专题研究

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

迟云飞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革命年代

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

袁祖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

迟云飞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

迟云飞 著

责任编辑：黄 林

责任校对：曾常红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9印张 226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7—81031—519—6/K·033

定价：9.00元（平）；16.00元（精）

《近代湖南名人专题研究丛书》序言

郭汉民

湖南人才的大批出现并令世人注目，是进入晚清时期、特别是到了近代才有的事。

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素称“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峻岭，河水湍急，舟车不易为交通。而且民性倔强，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故而在漫长的古代直至清朝中叶以前，湖南文化一直比较落后，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人文现象，湖南籍的名人更是寥寥无几。据张伟然博士《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统计，《汉书》所载士人凡 510，湖南为 0；《后汉书》载士人 990，湖南为 4；《三国志》载士人 625，湖南有 9；《晋书》载湖南士人 16 人；《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各载湖南士人 1 人；《隋书》中湖南士人又成空白；唐大中年间（公元 847—859）长沙刘蛻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正史中所载的列传人物，湖南籍人士在《唐史》中有 6 人，《宋史》中有 26 人，《元史》中有 12 人，《明史》中有 41 人。人才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程度的主要指标。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湖南文化在唐

中叶以前是很低下的，宋以后才有所进步。宋代道州人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和《通书》，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岳麓书院的建立和湖湘学派的形成，为湖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明清之际，又出现了王夫之这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但整个说来，清中叶之前，湖南名人仍是寥若晨星。诚如清末经学家皮锡瑞所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蛻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駉駉始盛。”（《师伏堂未刊日记》）杨昌济也说过：“考之春秋，楚地不到湖南，此后二千余年历史之上亦殊寥寂。”（《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

湖南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才状况的改变，还可以从长时段的统计数字中得到印证。日本学者因田一龟的《新中国分省人物志》收录自汉至明的历史名人凡5690人，按籍贯列表比较，湖南仅55人，占总数的0.96%；现代人物凡677人，湖南籍者42人，占同期总数的6.4%。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更详细一些。该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属湘籍者85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从0.77%到11.33%，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著名史学家谭其骧说得好：“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纽约出版的《北美日报》1986年7月1日的社论也写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转见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大门两侧有一幅闻名遐迩的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笔者尚未考察它作于何时，但可以肯定，只有到了近代才真正名符其实。

二

近代湖南人才蔚起，大体说来，先后产生过5个人才群体，或者说比较集中地产生过5批杰出的人才，并相应地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批人才出现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安化人陶澍、长沙人贺长龄都是嘉庆进士、翰林，外放历任各种职务，官至巡抚和总督。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对吏治、盐政、漕运、河工等弊政厉行改革；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上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刻书兴学，“洁己爱民”，其“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陶澍和贺长龄都是官声政声都很好的嘉道名臣。此外，湘阴人李星沅，长沙人劳崇光都是道光进士，历任知府、道员、臬司、藩司，官至总督。长沙人唐鉴，嘉庆进士，翰林，御史，历任府道臬藩，署两江总督，是著名的理学家，著《国朝学案小识》，曾国藩奉之为严师。益阳人汤鹏，道光进士，任御史，敢于上书言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因得罪权贵遭贬，著有《浮邱子》，为之作传的著名学者姚莹将他与龚自珍、魏源、张亮际并称为当时颇负盛名的“四子”。其中的魏源也是湖南人，生于邵阳（今隆回），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家。龚自珍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长期在陶澍、贺长龄幕府中佐理陶、贺推行改革。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坐而言起而行的改革家，著作等身的经学家，博古通今的史学家，造诣极深的舆地学家，诗文俱佳的诗人和文学家，见解独到的军事理论家，还是一个对净土四宗深有研究的佛门信徒。他生于1794年，死于1857年，生跨中古和近代两个时代，在思想文化史上，诚如恩格斯所说过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那样，既是中

古时代最后一个人物，又是近代最初一个人物。如果说，在近代湖南崛起的第一个人才群体中，陶澍是政治领袖的话，魏源则是思想代表了。这批人倡导经世致用，致力社会改革，特别是魏源代贺长龄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影响整个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此后，以皇朝经世文命名的大型文编就有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新编续编、统编、新增时务续编等，达10余种之多。经世思潮因湖南这批人士的大力提倡而兴起，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架起了一座桥梁。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向国人全面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沿革、风土人情等，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崭新命题，开辟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新思想方向。

第二个人才群体是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其领袖人物是湘乡（今双峰）人曾国藩。太平军起，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为团练大臣，他效法戚继光，不办团练而建湘军，他以农为兵而以儒为将，据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凡182人，除3人出身不明外，书生104人，占57.7%，书生领兵为湘军一大特色，高级将领中八成以上都是书生。曾国藩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凡立有军功者，均向朝廷大力保荐，使之得以迅速升迁。10多年间，湘军将领升至总督的就有湘阴人左宗棠，湘乡人曾国荃、杨昌浚、刘岳昭，衡阳人彭玉麟，长沙人杨岳斌，新宁人刘长佑、刘坤一，浏阳人李兴锐，邵阳人魏光燾，包括曾国藩自己有11人。升任巡抚的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源、江忠义，湘乡人刘蓉、刘锦棠、蒋益澧、李续宾、李续宜，宁乡人刘典，凤凰人田忠恕，桂阳人陈士杰等13人。升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达100余人。《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中，咸丰、同治、光绪3朝共有142人，其中湘籍40人，占28.2%。人们说“中兴将帅什九湖湘”，谅非虚语。

诚然，以曾国藩为首的湖南人才群体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础上成长壮大起来的。这是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当然可以予以谴责，但更要看到的是，他们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干了些什么？以曾、左为代表的湘军领袖参与发起以求强求富、师夷制夷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翻译西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设近代海防海军等，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镇压欧洲 1848 年革命的那些刽子手，不得不沿着革命所追求的大目标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 1848 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太平天国后期领袖洪仁玕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但太平天国本身无力实现这一任务，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曾、左等人实际上也成了太平天国遗嘱的执行人，尽管它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个人才群体出现于 19 世纪最后 5 年间。由于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迫切形势，以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因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继者徐仁铸等开明官员在湘厉行新政，湖南得风气之先，浏阳人谭嗣同和唐才常，凤凰人熊希龄等承时而起，与长沙人皮锡瑞、杨毓麟、毕永年、沈荃以及邵阳人樊锥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维新士人群体，谭、唐二人被称为“浏阳双杰”，且以维新派左翼首领先称于时。这批人与前两个人才群体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们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是被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召唤到历史舞台上来的。诚如梁启超所说：“湖南向以守旧闻天下，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

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戊戌政变记》）

第四个人才群体出现于20世纪初，即辛亥革命时期。维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批“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的士子们除谭嗣同血染菜市口，唐才常、林圭等10余人牺牲于自立军起义外，多数都随时代潮流而前进，不少人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驰骋宇内的革命英杰。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第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国民报》、第一部宣扬孙中山的译作《孙逸仙》、第一个建立在国内的革命团体华兴会、第一本宣传革命思潮的文集《黄帝魂》、同盟会成立后最大规模的萍浏醴起义等许多“第一”都与湖南人的名字分不开。190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携手组建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是长沙人黄兴，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9人中，湖南20人，又占了第一位。1905—1907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而有名册可查的，湘籍157人，四川、广东、湖北均在其后。正因为如此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反清革命，因而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斗争，不论是组织的、宣传的或是武装暴动、暗杀活动，都有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并在斗争中涌现出饮誉中外的一代英豪，除黄兴外，还有桃源宋教仁，邵阳蔡锷，新化陈天华、谭人凤，湘乡（今双峰）禹之谟，湘潭刘揆一、刘道一，澧县蒋翊武，益阳姚宏业，常德刘复基，浏阳焦达峰、陈作新，醴陵宁调元，长沙章士钊、杨毓麟、秦力山等。衡阳陈撝芬、湘乡张默君、衡山唐群英是此时声名远播的女杰。此外，湘潭人杨度，曾为留日学界之领袖，后投身立宪运动成为风云人物，影响亦很大。民初助袁复辟，晚年又追求进步，营救李大钊，并在白色恐怖之下加

入中共地下党，这是一个情况复杂、经历曲折、但给历史留下重要影响的“旷代逸才”。

近代湖南人文荟萃，五四时期出现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可视为第五个人才群体。这些人中不少成为日后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方面的领袖人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495名党史人物中，湘籍89人，占18%，其中勋名远播，功业非凡者，湘籍人物更是数一数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6.1%。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10大元帅湘籍有3；大将10人，湘籍其6；57名上将中湖南籍19人，“三分天下”有其一。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毛泽东早期文稿》）应当说，近代以来，湖南人腰也伸了，气也吐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真正名符其实了。

三

如前所述，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历史上曾涌现出许许多多著名人物，特别是近代以来，出现了人才蔚起的盛况。在这些著名人物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这就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

经世即通经致用，经国济世。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治国平天下；从学术风气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简言之，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讨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

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学以致用，“留心经济之学”。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实”的标准，将清初以来有关政治、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成书，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对湖南士风影响甚大，“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有用世之志。”（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时常以诸葛孔明自许。18岁时已将《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潜心研究舆地、兵政、农学、水利，日后他能带兵打仗，所向披靡，收复新疆，开发西北，倡办洋务，都与此大有关系。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他将理学与经世结合起来，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他自己亦注意“讲求经世之学，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直到晚年劝学仍主张“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左之后，这种经世学风在湖南更加发扬，连1897年建立的时务学堂都将“经世”列为学约之一。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中外冲突与民族战争的频繁发生，爱国主义更是大为发扬。“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较之其他省区，湖南人救亡图存的反帝爱国思想表现得更为突出。20世纪初年，湖南留日学生即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云：“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

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以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近代湖南人的爱国主义表现出如下3大特点。一是强烈的救国使命感和责任感。甲午战后面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谭嗣同满怀信心地写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全集》）唐才常引用外国舆论说“拯支那者惟湖南”（《唐才常集》），南学会的成立即出于“保湖南以保中国”之意。《时务学堂公启》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就更集中地体现了近代湖南人的爱国情怀与历史使命感，可以说已成为近代湖南志士的普遍心态。二是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地结合起来。近代爱国主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抵制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要学习先进的西方，争取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最早把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曾、左等人发起洋务运动，把师夷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并向前推进。过去人们指谪曾、左搞洋务只是为了“剿发捻”，即镇压人民反抗，这并不确切。实际上，抵制外国侵略是他们倡办洋务的主导思想。他们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时，就已认识到外国势力是比太平天国更为可怕的敌人。胡林翼观洋人汽船西驶而吐血堕马，曾国藩因英法横行而夜不能寐。他主张“以忠刚摄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复李鸿章》）。为此而发起洋务运动，爱国精神勿庸置疑。如果说曾、左办洋务只是“窃制器之术”的话，谭、唐等人搞维新运动则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了，他们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以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继他们而起的黄兴、杨毓麟、秦力山、章士钊等则把反帝爱国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相结合。当民主共和变成军阀政客手中的一块

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湘籍志士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三是为了救国而勇于献身。近代史上湖南志士以身殉国之事屡见迭出，十分引人注目。为收复被俄侵占的边防重镇伊犁，69岁的左宗棠“舆棕出征”早已传为佳话。谭嗣同舍身变法，变法不成，则杀身以殉所信，其为救国强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到了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蹈海投江以身殉国的湖南人就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易白沙。蹈海自杀虽然不足为训，但他们炽烈而真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可与日月同辉。

湖湘学派创始之初，就反对虚浮之风，提倡务实践履，经代代传承，在湖南士人中逐渐形成一种不尚空谈，务实求实的风尚。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际，在社会机陉、国势阽危的形势下，这种务实风尚往往会发展为重视践履、身体力行的实干精神。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要以“实”来“自正其心”，“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说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稍）正天下浮伪之习”，曾国藩不论治身、治家、治学、治军，处处体现着这种务实作风。以后湘籍官员如左宗棠、彭玉麟、曾纪泽、郭嵩焘、刘坤一等又在军政、民事、外交等方面作出了明显的实绩。“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湘雅摭残》）写的是左宗棠开发西北的功绩。“新栽杨柳三千里”就体现了湖湘子弟的实干精神，否则，就不可能“引得春风渡玉关”。维新运动中，湖南志士虽不乏奔走呼号的救亡宣传，但更强调“略去虚文，专求实用”，注意新政的切实推行。从创办矿业、水利、小轮公司、制造公司到创办《湘学新报》、《湘报》、时务学堂，设保卫局、课吏馆，建南学会等，桩桩件件，可谓落到实处。单就学会而言，据有人统计，1894—1898年全国

共64个，湖南一省19个，几占1/3。若非湘人务实，焉能如此？20世纪初民主革命风潮腾涌之时，湖南志士从创办报刊、著书立说、从事革命宣传，到建立各种革命团体、发展革命组织，到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从事武装起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处处体现着湖南人的务实作风。这种作风的典范就是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克强。躬行实践，崇实笃实，求真务实是黄克强思想品格的主要特征。辛亥时期历次武装起义，他几乎无役不与，或亲身策划，或实地指挥，出入枪林弹雨，无所畏惧，毫不退缩。正是这一系列躬行实践的范例成就了他的英雄业绩，给他树起了革命实行家的高大形象。陈其美曾对辛亥革命两个主要领袖的性格作风作过比较，认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毛泽东早期文稿》）章太炎誉其“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蔡锷说他“以勇健开国，以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均为确论。

除前述经世、爱国、务实之外，近代湖南的人文精神还有“奋斗”二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这种乐在奋斗的精神，正是近代湖南人奋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正是湖南人文精神的特征之一。

1920年1月，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

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陈独秀拿历史证明湖南人的奋斗精神，言之凿凿，王船山、曾国藩、黄克强、蔡松坡，这四个人身上确实可以体现出湖南人特别强烈的奋斗精神。

王船山是明清之际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杰出思想家，青年时代曾举兵抗清，当过南明永历朝的行人司行人。33岁返回湖南，知事不可为，又誓不降清，“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窜身瑤峒，绝迹人间，席棘怡茶，声影不出林莽”，他一岁数迁，流离困苦，崎岖岭表，备尝险阻。就是在这种无与伦比的艰苦条件下，王夫之专心著书，据有人统计，其著作计有100余种、400余卷，800多万字，流传至今者还有73种，401卷，470余万言，100多种版本。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云：“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其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坚强志节，历劫勿渝。谭嗣同说他“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卷上）

曾国藩深受船山影响，称船山为“命世独立之君子”。湘军初起，困难重重。他以公忠诚朴为天下倡，与左宗棠相约，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于骨岳血渊之中。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他常常是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身处逆境则“打落牙齿和血吞”，奋斗精神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奋斗精神影响及于黄、蔡。黄兴称曾国藩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在语录的一则按语中蔡锷写道：“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报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

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当然，我不是说黄、蔡的精神都源于曾国藩，实际上他们是受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民主革命中不怕苦，不怕死，不求名，不逐利的志节和奋斗精神都令世人敬佩。黄兴戎马一生，每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且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始终保持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高尚情操。蔡锷在识破袁世凯卖国求荣、帝制自为的阴谋之后，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相约“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盾鼻集序》）他抱病潜赴云南，起兵讨袁护国，他担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分左、右两纵队进军川南，在纳溪、泸州一带与器械精良、食物充足的100000袁军作殊死战斗，梁启超回忆说，“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哪里。哎，我真不知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动到如此。”（《护国之役回顾谈》）蔡锷舍身忘死为捍卫共和而奋斗，护国战争胜利不久，他即因病情加重而去世，终年仅34岁。

如果说陈独秀不因杨度而废言的话，我们也应不因陈独秀而废言。陈独秀“拿历史证明”湖南学者、书生和军人都有一种可贵的奋斗精神，王、曾、黄、蔡只不过是奋斗精神的几个突出典型罢了。

总而言之，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及其代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可贵精神。继承和发扬这种精